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

《袁中郎行状》笺证

炳烛集

李健章 著

根澹葉茂 實一貫清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

《袁中郎行状》笺证

炳烛集

阮章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李健章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9861-9

I. 袁… II. 李… III. ①袁宏道(1568 ~ 1610)—文学研究 ②袁宏道(1568 ~ 1610)—生平事迹 IV. ①I206.2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396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笛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0 字数: 427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861-9/I · 594 定价: 87.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 出版说明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曾合为一册于1994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次因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我社根据本书在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发行的版本。力求保持全书原貌的前提下，对一些文字与句读的明显错误做了订正，并附录李健章先生的小品文一则《柳浪春潮》。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 再版前言

熊礼江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简称《志疑(外二种)》)是武汉大学李健章教授研究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代表作,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当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来,钱伯诚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扫描本《袁宏道集笺校》(2008年版),除将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前言全文编入《重印新增》外,还在《重印后记》中郑重而又语语由衷地说:

又特选录李健章先生所著《〈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外二种)》一书前言及附来信,目的是为引起读者对《志疑》一书的注意。此书抉微探幽,用力至勤,补正《笺校》缺误,为一功臣,应该受到重视。1997年我有武汉之行,曾拟去武汉大学面谒请教,适李先生因病入住医院,未得如愿,带讯致意。次年即闻谢世噩耗,为之惻然,书此志念。

李、钱二先生的“互动”,诚为当代公安派研究活动中的一段佳话。我们既仰慕钱先生虚怀若谷、惟真是求的学者风范,同时又佩服李先生治学探赜索隐、必中肯綮的功力和作论寓严正于宽容之中的学术魅力。事实上,当今海内外研究公安派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李先生《志疑(外二种)》的作用,可惜当年印得太少(仅800册)。现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其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再版刊行,实在是做了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

大家读《志疑(外二种)》,都知道李健章先生是研究公安派的专

家。其实李先生学养极好，所长亦多，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和古文、诗、词创作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值此《志疑(外二种)》再版之际，特借前言些许文字对先生生平、治学特点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李健章(1912—1998)，字晦之，安徽肥东人。少年时在乡村生活，读过私塾，承受传统教育；后来刻苦自修，补习新知识，19岁始入中学接受新式教育；193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后，曾执教于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旋于1941年应武汉大学之聘回母校任教。1946年自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抗战时校址所在地)复员还乡，在安徽大学任教一年即被武汉大学(已迁回武昌珞珈山)召回。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和生活。从1941年起，李先生就开始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被聘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数度出任中文系主任。1979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

李健章先生治学功底深厚，可以说是终生研习、历练的结果。先生幼承庭训，即以受经读史为乐，以致“平生爱谈经，颇有《左传》癖”(李健章《购得学海堂〈经解〉》)；诵读名篇佳作，辄生习作之心，故其一生爱好诗、词、古文创作(甚至写过小说)。本来，先生在大学受业期间，亲炙刘博平(贻)、刘永济(弘度)等大师之教，在小学、文学方面已有较好基础，后来为人之师，更自磨穿铁砚，刻苦钻研，学有专长。此时他写了不少研读子、集之书的诗篇，如《读〈韩昌黎集〉》四首、《冬夜读陶诗》九首、《读〈柳河东集〉》五首、《读归熙甫〈项思尧文集序〉》二首、《读〈墨子〉》四首、《读〈荀子〉》六首、《午日读〈离骚〉》六首、《读〈方望溪集〉》五首、《读〈惜抱轩集〉》七首、《读〈庄子〉》五首等，皆是。而他在诗中说《庄子》“妙理玄思通比兴，机锋触处悉逢原”，“说理为文尽入虚，参差淑诡异他书”(《读〈庄子〉》其四、其五)；说韩愈为文“师古别有立，乃收创造功”，为诗“别辟一蹊径，变格见雄奇”(《读〈韩昌黎集〉》其一、其二)；说“屈原作离骚，博喻抒怨悱；有唐柳柳州，千载遥相继”(《读〈柳河东集〉》其三)；说归有

光“属意为文须自得，权衡在我岂因人。藻思元气同流处，方见辉光与日新”（《读归熙甫〈项思尧文集序〉》其二）；说方苞“积句成章就矩绳，修辞雅洁实难能。望溪文脉精微处，气味清淳最足称”（《读〈方望溪集〉》其二）；说姚鼐“为度金针编此集，精粗法式寓其中”（《读〈古文辞类纂〉》其一）；说“刚柔异美别阴阳，物类群分各显扬。参透森罗万象理，姚翁据以论文章”。“置句裁章系语言，简明切当忌枝烦。古文传至桐城派，精密堪称不二门”（《读〈惜抱轩集〉》其三、其四），所言则涉及古代诗文流派的文论主张及其由来和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及其成因，不但知其然，还能道其所以然，往往于前人共识之外自有所见，远非一般学者读书仅仅得其知识所能比。由于所见悉从研读原著、用心涵泳、揣摩而来，故有其难得的独特性、深刻性。而在诵读、体味作品的基础上，将其感性认识经过综合分析上升到理性认识，正是李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

李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另外两个特点，则与其特有的才思和职业性质有关。李先生赋有创作才能，而且勤于写作。诗中的古体、近体，词体中的长调、小令，古文中的墓志、碑文，他都有作品问世。1949年以前所作诗词即有《居蜀集》、《东西集》合为一书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作诗词以古体诗最多、最见功力（与其擅长古文写作一致）。所作墓碑文字有刻石立于乐山、安庆、武昌者，而以镌刻在武汉大学六一亭中碑上的碑文最为著名。碑文作于1948年白色恐怖之中，记述1947年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的经过和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的三位学生的生平。时当“腥风血雨，扰攘尘寰”，故行文“缜密修辞，机锋暗敛”（李健章《柳梢青——为武大作六一亭碑记，通宵失眠》其二、其一），出言简而有法，颇有《春秋》风味。就治古代文学而言，学者有无诗词、古文创作经验，对古人作品艺术美感悟的深浅程度是大有区别的。大凡有经验者多能体会古人创作之甘苦，洞察古人修辞之匠心，且能言之入微，不隔不离，既中肯綮，又可以准确把握其风貌特征。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能借鉴自己的创作艺术经验而深入、细致阐述作品内外之美、准确判断作者创作得失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故其论诗、论文，说的都是内行话，可谓贴切、精当。



李先生常年在中文系教书，带来了他治古代文学的又一特点。一般说来，大学教授总要自编讲义作教材，他“教”的是自己写的“书”。但从讲义到成为学术著作的“书”，有一个漫长过程。本来讲义中已容纳编者诸多研究心得，但高明的教授每讲一次课，都可能因温故知新或教学相长而激起新的感悟、产生新的看法，讲一次有一次新的体验，经过几次甚至几十次的讲授，积累的心得就会愈来愈多，对问题的认识就会愈来愈深、愈来愈全面，经过不断打磨、修订，讲义最终蜕变为极具个性色彩的学术著作。许多著名教授的名著就是这样产生的，李先生的著述亦不例外。欲知其事，读读先生记述授课心得的诗作即可明白。如《初任韩柳文课》其二说：“古文造句贵单言，刊落浮辞见本原。曲折随心呈百态，别开生面自韩门。”其三说：“文窥孟子思传道，业授刘叉误识人。不是因金谀墓主，各如其面为存真。”就道出了古文文体的基本特征和韩文，特别是韩愈墓碑文艺术创新价值之所在。其四说：“雅健雄深似子长，退之评柳重文章。精心漱涤呈奇采，百态牢笼诘避藏。”其五说：“入而能出最高明，子厚淹博论辨精。无奈后儒疑害道，反教因议受苛评。”则道出了柳子散文复古创新的奥秘、柳文的总体艺术风貌及其记体、论体之文的优长之处。再如《初任欧、王文课》其二说：“文宗吏部加姿态，委备纤余见雅裁。成就修辞条达美，艺园关钥始全开。”“王文拗折似虬松，刻镂圭棱助壮容。消尽柔肌成瘦硬，惯将枯笔作奇峰。”对欧、韩关系和欧、王古文的风格取向、突出特色及其修辞喜好都有精到的论述。又如《讲授中国散文史》其四说：“琢句雕章各务新，抑扬生韵妙通神。会心应在言辞外，此味如何说与人？”分明讲的是如何领悟古文神气、韵味的鉴赏方法和作者陶醉其中、自有所得的微妙感受。这些还只是先生用诗记述的讲课心得，至于写在讲义天头地尾、左右空白处的批注，更是新陈相续、密密麻麻。知乎此，当于先生所说治学“专一为能人，博学期积厚”（《读〈荀子·劝学〉》）的“积久”之功有深刻理解。

正由于先生“博学期积厚”，且积学有术，而平生著述（包括《韩愈“以诗为文”辨》、《关于〈长恨歌〉的评价问题》、《试谈继承古典散文传统》、《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等论文）“都是从长期读书所

积累的资料细绎而成”(《〈志疑(外二种)〉后记》),所以大多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从先生在《〈志疑(外二种)〉后记》中,把他出版该书和“为下一个世纪袁宏道诞辰五百周年(2068)纪念大会作充分准备”联系在一起,就可看出他做学问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也可感受到他对自己著述学术生命力的自信心。想到有些学者所作论文虽多,但因深受时风熏染,缺乏积学、磨砺工夫,立论经不住时间考验,根本无法集出版面世,愈发觉得先生学风的可贵。

李健章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家,有《先秦两汉文学史》、《宋元明清文学史》讲义存世(后者因故只印到《三国演义》一章),同时对魏、晋、唐代文学史做过专题研究,而他最见功底的特长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应该承认,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古代散文研究是最困难的,但先生却是中文系近百年所出现的两三位专家之一。第一位是王葆心(1869—1944)先生。王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1906年就出版了集古文之学之大成的《古文辞通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此书作教材在中文系教授诸生。第二位是黄焯(1902—1984)先生。黄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他在中文系讲授古文作品,特别注重对古文艺术美的体验和领悟。同时主张治古代文学,当从治古代散文始。第三位就是李健章先生。如前所述,李先生幼承庭训即对散文产生兴趣,年轻时读古文更有志深究古文之学,说是“但愿敲门能入室,拍浮终老古文渊”(《读〈古文辞类纂〉,计半年可毕》)。“赖有枕中书,文渊可久挹。黽勉而不反,庶几能强立”(《读〈韩昌黎集〉》其三)。之后,创作古文、评注古文、讲授古文作品和古文理论、撰写研究古文的论文,终于成为中文系紧随王、黄之后在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学养最深、用力最多、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专家。而这正是他研究公安派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健章先生是从1962年开始研究公安派的,《〈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所收文章,以及书后所附绝句30首,实是他研究公安派的部分成果。先生于此“颇自珍惜”,就在于这些成果确实有它们独特的学术价值。

公安派是出现在晚明的一个文学革新流派,其核心成员是出生于

公安县的袁宗道(伯修)、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三兄弟,袁宏道则为其领军人物。故李健章先生耗费近二十年心力研究公安派,而用力最多的是对袁宏道生平、著作的研究。读《志疑(外二种)》各部分的内容,应先了解李先生对公安派的基本看法和他研究公安派的基本方法。关于前者,他说:

公安派以其勇于革新的文艺思想和力图突破旧格套创立新文风的创作实践,鲜明地反映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引起的新和旧的严重分化与对立,作为阶级新意识的进步标志,表现了那段社会历史重大变化的时代精神。这种情况,在我国三千年的古代文学史上,除先秦时期以外,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它还很单薄,不够成熟,只上阵猛冲几下就退却了,终于夭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离开封建传统独立地发展下去。但作为标志着历史发展一次重大变化的里程碑,它肯定会永远保持自己的光辉,得到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愈来愈多的重视(《〈志疑(外二种)〉后记》)。

李先生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演变的角度肯定公安派的历史地位,而对公安派出现的文学史意义有所忽略,但其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后者,他说:

我的研究方法,着重钻研作品和史料考证,留心公安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趋向,进而根据这些新的特点和趋向,探索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与当时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哲学思想方面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联系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观察、分析,希望尽量减少一些主观性和片面性(《〈志疑(外二种)〉后记》)。

“着重钻研作品和史料考证”、“留心公安派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趋向”并探索其根源,是他研究公安派、袁宏道

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的本质特征，就是一切从文本出发，实事求是地探求事物的特点及其成因。这样研究问题，所得结论应该是靠得住的。难得的是，他不但将这种方法用到以考辨为主的文章中，而且书中以理论分析为主的论文，也主要是用这种方法研究、撰写出来的。以下即结合实际，依次陈述《〈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的内容、表述方式及其学术价值之所在。

先着重说说《〈袁宏道集笺校〉志疑》(简称《志疑》)。此集所记，乃作者研读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简称《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遇有错误、考辨以正的部分条目。“粗略分为笺释词句、人名、地名、事迹年月、史料笺引、校勘、句读计七类”(《〈志疑〉前言》)，共104条。《志疑》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学界长年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人们以为不成问题的问题，问题的解决，自然大有利于对袁宏道、公安派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评价。无奈袁宏道学识淹博，其“上至经史百家，入眼注心，无不冥会；旁及玉简、金叠，皆采其菁华，任意驱使”(袁中道《袁中郎行状》)，而为诗为文精于用典选词，故笺校有误，难以避免；能纠正其误，则须有胆、有学、有识和有坚忍不拔的意志、穷原竟委的精神。

考证史料是李先生纠正《笺校》之误的基本手法，像《笺释事迹年月志疑》第九条，引钱谦益《初学记》卷四十八《王公行状》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述王图中万历十四年进士第，订正《笺校》引《明史·王图传》“万历十一年进士”之误；《笺释地名志疑》第二条，引《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千三百四十五《肇庆府山川考三》德庆州“锦石山”条、卷一千三百五十四《肇庆府部纪事》陆贾默祷以锦裹石条，订正《笺校》以《别李年兄》之“锦石”为“锦石滩，公安江心小洲”之误；《笺释人名志疑》第一条，连举七项史料和事实证明“龚散木能者”系龚散木(宏道之堂兄)、龚能者(龚仲安)之连称，而不是《笺校》说的指龚仲安一人，这些是用过硬的材料说话，使误解臆说不攻自破的显例。

不过，《志疑》中的许多条目不单用史料考证以言其误，还常常借助(或结合使用)对《笺校》所言是否符合诗文立意、艺术构思、结构层次、修辞方式、语法特点以及袁宏道文学革新思想、写作习惯的

分析，来确定其为非。李先生熟谙古代诗歌、散文的艺术特点，创作经验丰富，将其所长用到考辨文字中，自会成为考辨文字的一大亮点。如《笺释词句志疑》第十条，言《笺校》释袁宏道诗“先生吟诗新履道”之“履道”为洛阳“履道里”，并谓“此有双关意，指弟履道”之为非，说：

“履道”作地名解，不能确切表示它和上下结构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充分反映作此《和谷字韵》诗时余兴甚豪的生活激情，而离开与所和诗的前后联系，便无法从创作的全过程把握诗人构思时起伏颤动的心弦。如改释为诗篇名，和白居易《履道居》等诗衔接起来，作一比照，则情态毕现，前后一贯，上下皆活。下句的“纱縠”，指砚之石纹。新的“履道诗”偶对旧的“纱縠砚”，既工巧，又真切。所谓新的履道诗，即指此诗所和的自己原作——《谷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谷字限韵》。这首诗，狂放恣肆，豪情腾涌，很像他前期《解脱集》那种任意挥洒、痛快淋漓的诗风。大概由于一时高兴，视为得意之作，所以自写自和，兴味盎然。

这段考辨文字就全从分析诗作由来、诗意、诗情、诗人创作心态入手，判断诗中语词真实含义，以正望文生义之误。《笺释词句志疑》第五条，言《笺校》说宏道《天池》“宛尔秦余”之“秦余”为“秦余杭山”之为非，讲“‘秦余’是从‘秦火之余’缩减而来的”。“因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正是秦火之余的遗民，所以唐代诗人便用‘秦余’作为桃花源的代称。”“袁宏道把天池境界之美比作桃花源仙境，是在‘低回片晷’之际对美的联想，所以用‘宛尔秦余’来表示。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见其情景交融，文辞美妙，显出下句‘马首红尘，恍若隔世事矣’的特殊意义。”末段所言，不啻抉出《天池》文眼，还能点破中郎文心。他如《笺释年月事迹志疑》第五条，言《笺校》说宏道诗《寄杨敦初》作于北京之为非，即“从这诗的艺术构思和整个结构来看”；第六条言《笺校》说宏道诗《秋夜感怀》作于万历二十二年之为非，即“从立意和用典的情况看”；《史料笺引志疑》第一条，言《笺校》说宏道诗

《病起偶题》其三“浮名我失弓”之“失弓喻浮名”、“用楚王失弓故事”之为非，即谓“‘以弓喻浮名’，表示无意追求，则与下面‘一番三径里，秋菊又成空’的感伤叹息语句连不起来，与这组诗的消极失望、发泄牢骚的基调不一致，也和袁宏道少年时期热心功名、急于求成的主导思想不合”。《校勘志疑》第二条，言《笺校》改宏道《病起偶题》“名起儒冠误”之“起”为“岂”之为非，即从“试析五律中用‘岂……因’的连句式”“句型结构”入手，谓其“把作者造句的原意完全搞反了”。“如改‘起’为‘岂’，则上下结构皆乱”，都是借助诗歌艺术分析来作考辨的例子。

和借助于诗歌艺术分析以作考辨一样，在考辨中借助于古代散文艺术分析的条目也不少。如《标点句读志疑》第一条说“这几句既层次严整，又一气连贯而下，所以具有强化文势和语气的特殊效果，提高了对杨《志》‘无容挂帆’之说的反驳力量”。第二条说“其构思之巧妙，用典之灵活，表现了袁宏道在散文语言方面‘变板重为轻巧’的造诣和历史贡献。如破解此句，不但打乱章法结构，失去文辞之美，而且突然直指‘古人如虫蚀木，也不合文理’”。第六条说“‘渐靡实’，不合古文句法；以‘然’字属下句作转折连词，亦和前后的文势不合”。“如在这些赞美语句之前冠以表示转折的‘然’字，不但降低了称赞的分量，累赘无益，而且模糊了严整的结构，削弱了峭拔的气势，使文辞之美受到很大损害”。第十条说“以这两个词组为主语，则结构分明，气势贯注，下文皆活”。第十一条说“从篇章结构看，若将标点句读作如下调整，则语言简练、精当之美立见”。这样从体验散文创作艺术的特点出发，不仅多了一种考辨错误的途径，而且因艺术赏析之引人入胜，其持论更多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说服力。

至于结合公安派文艺思想、创作实践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趋向来作考辨，《校勘志疑》第七条说《笺校》改宏道“优人驷从，共谈雅道”之字，“变换了所指对象，与上文脱节，也和袁宏道重视民间文艺的主导思想不合”，即为一例。但最为精彩的，是《笺释词句志疑》第三条和《史料笺引志疑》第七条所言。

前者考辨《笺校》说宏道诗《答李子髯》其二“评论时下诗风，反对

拟古”之误，连说三条理由。“首先，《答李子髯》二首所谈的，是关于诗文的改革方向和创作方法问题，并非专论时下诗风。”“其次，袁宏道反对专在诗文词句上模拟古人，但并不否定在文风萎弱不振时期倡导复古运动、能起改弦易辙的推进作用。”“再次，古代作家常用‘草昧’这词形容建立特殊业绩之初的冥昧环境，以显示开创缔造之功。袁宏道这诗首句‘草昧推何李’，也取义于此，是对何、李倡导复古、转变当时萎弱文风的称赞，毫无贬义。”最后强调说：“混淆了所谓‘复古’和‘拟古’的界限，不但无法解释这首诗，还会对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引起误会。”

后者言《笺校》说李贽《复耿侗老书》所谓“新奇”与宏道“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意同”之为非，出语要言不烦：

李贽和袁宏道所论的“新奇”，是属于借用同名词的外壳而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他们所强调的方面恰恰相反。李贽所论，是哲学上“平常”与“新奇”这一对范畴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新奇即寓于平常之中，反对于平常之外另觅新奇，特别强调人心物理共性的一面。袁宏道说的，是文学创作中独创与模拟这两种方法的严格区别问题，认为只有“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才能创作出真正新奇的作品，获得艺术生命，反对模拟剽窃，庸谈套语，特别强调必须显现作家个性的一面。总之，李贽和袁宏道致友人书中所论述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各有其着眼点和针对性，作出的结论也毫无相似之处，不能单从“新奇”这个词的字面上进行推断。

由此可见李健章先生对公安派、袁宏道文学革新思想的要义把握得何等精准，对问题的辨析何等深细入微。而细读上引几则文字，我们又会感到先生的文笔何等朗畅、峻洁。事实上，《志疑》中的多数考辨文字，不但订正错误，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说理严谨、行文有序，每篇都可视为自具首尾、结构完整、独立成篇的小论文，使人读起来既能引发理性思维的乐趣，又能受到弥漫其中的文学韵味的熏陶。

此外，《志疑》的文风也值得称道。关于《志疑》的文风，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94年7月11日夜，久热忽雨，我去拜访健章先生。先生先是讲他在乐山请教刘博平先生的故事，说有一天看见刘博老读《姚惜抱集》，就问他姚氏文章好在哪里？刘博老回答说：“他很会说话。”李先生说：“什么叫会说话？就很难说了。”接着对我说到撰写《志疑》之事。意谓初读《笺校》发现错误甚多，且有些错误属于常识性错误，颇不以为然。立作驳论，遣词造句，火气十足。后来冷静思考，以为钱氏草创《笺校》乃大不易，做人、做学问皆应厚道、谦和，行文当寓严正于宽容中，于是集纠谬文字为《志疑》。虽然考辨以正其误不遗余力，而出言语气平和，惟恐有强词冷语伤人。特将各条判断语改为“校改似误”、“句读似误”、“笺引似误”、“似欠妥”、“校补亦不确”、“似应作某，不应作某”等，均用揣测词“似”以缓和语气。李先生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读《志疑》，总会想起他在那个雨夜和我谈话的神态。他认为文风源于人风，我想今日《志疑》再版问世，必将以其文风久久播扬先生人风于世间。

再说《〈袁中郎行状〉笺证》和《读〈袁中郎集〉，得三十绝句》。《袁中郎行状》是《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的简称（简称《行状》），它是袁中道撰写的记述袁宏道生平事迹最完整最真实最具权威性的文献，同时也是中道一篇优秀的古文作品。朱荃宰《文通》卷十七说行状“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按行状者，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上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中道写《行状》，是为请人替宏道作墓志铭提供基本材料。所谓“欲哀次先生遗事，以求海内二三巨公为志铭，以垂不朽”（《行状》）。行状之作，汉已有之。唐、宋古文家如韩、欧等写墓志铭，一般先要细读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行状，遇到叙事含糊或泛言其事者，还要一再询问家属。欧阳修嘉祐四年《与梅圣俞》书，就说“其如行状中泛言行己，殊不列事迹，或有记者，幸更得数件，则幸甚”。“寻常人家送行状来，内有不备处，再



三去问，盖不避一时切切，所以垂永久也”。故陈绎曾说“行状，宜质实、详备”（《文说》）。“质实”就文风言，指叙事朴质、实在；“详备”指所记之事详细、完备。先生说《行状》“在结构和选材方面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从出生至去世严格按照实际经历的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分阶段有重点地记录宏道在各个方面的起伏变化，用纵的编史方法显现其为人；一是着重表现宏道有胆有识的政治才能，填补了被文学名声所掩盖而容易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从而延伸横向的社会联系，把知人论世展示在万历年间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行状》笺校》前言）。此外，叙事具体生动、评议概括准确也是《行状》写作的一大长处。总之，就古文艺术要求而言，中道《行状》在唐宋以来的众多行状中，亦可称为上乘之作。本来，好的行状稍加改动即可成为好的墓志铭（欧阳修《与杜沂论祁公墓志铭》就说“乞且令韩舍人将行状添改作志文”），故李先生评论无人为中郎作墓志铭事，即言：“其实，中道既撰述了如此完美详尽的《行状》，即使有人操觚染翰，亦不过取其大略，敷衍成文而已。可以不有，也就无所遗憾了。”

李先生十分看重《行状》的文献价值及其行文特点，认为它既以叙事为研究宏道生平提供可靠史料，又以评议给予品评宏道其人以诸多启示，故用心搜寻相关资料，逐句加以笺证。方法则是将近六千字的《行状》从头至尾依内容层次分为18个单元，每单元又分为若干小节，以每一小节的内容为准，选择相关资料依文附录，对其要义、事实加以证明、诠释、补充，然后束以“按语”。“按语”实是李先生对《行状》和所引资料言及的事、理所作的说明与评论，其间容纳不少发人深省的学术见解。比如第四单元《行状》有谓：“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即引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翼乎”句释文中“浩浩焉”句，引《大般涅槃经》“愿作心师，不师于心”句释文中“能为心师，不师于心”句，引《楞严经》“为物所转”句和《坛经》“心迷《法华》转”释文中“能转古人”句，引《鄂州岩头全夔禅师》“师云”句释文中“发为语言”句，且于后二段引文后加上按语。第三段后按